

“落叶归根”还是“量力而行”？

——退休农民工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

康蕊 王震 潘健平*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探讨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模式是受“落叶归根”等传统观念还是“量力而行”的经济状况影响，即选择在城市还是农村养老，选择由谁照护，究竟是传统观念还是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加入养老收入的变量后，以往文献中证明的传统观念对养老的影响不再显著，即养老收入决定了当前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模式，具体体现为：第一，养老收入较高的和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倾向于在城市养老，反之则回农村养老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养老收入较高的和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养老院等养老服务，反之则由亲属照料或无人照料。因此，本文建议重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和退休农民工再就业等问题，以增加养老收入为出发点，降低进入门槛来保障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服务供给，以满足新时期退休农民工的养老需求。

关键词 退休农民工 养老收入 城乡养老 养老服务

一 引言

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已达到退休年龄，本

* 康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kangrui@cass.org.cn；王震（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wangzhen@cass.org.cn；潘健平，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panjianping11@126.com。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研究”（17BJY2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容错机制与国有企业创新投资：影响机理及经济后果”（71902024）、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PPP模式下首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研究”（19YJA005）、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项目“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收入调查”的资助。

文将达到退休年龄且有过农民工经历的老年人定义为“退休农民工”。养老模式是指“在哪养老”和“由谁养老”两个方面，农民工群体在退出劳动大军之后，安顿到哪里又由谁提供照护，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以上选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退休农民工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历了离土离乡的外出打工生活。中国自古以来“落叶归根”、“养儿防老”等传统意识观念在退休农民工群体的养老模式选择中是否依然重要，是大多数文献研究影响退休农民工选择在城市还是农村养老、是否选择由子女照护的视角之一（于长永，2012；郭秋菊、靳小怡，2016）。当然，一些文献也探讨了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经济状况的影响（朱玲，2014；秦雪征等，2014；孙婧芳，2018）。那么，究竟是客居他乡的人终要回到本乡的传统观念影响更深，还是随着当前退休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后，依据收入量力而行地选择留在城市养老？2018年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收入平均为26723.41元/人/年，77.50%由养老金提供经济保障，选择在城市、农村养老的退休农民工占比分别为44.45%和55.54%，由子女等亲属照护、依靠机构或社区养老服务、无人照护的占比分别为84.83%、7.58%和7.58%^①。首先，尽管返乡养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但数据反映了当前选择在城市、农村养老的占比相差并不多，因而预判另有来自其他因素的影响。其次，农民工的养老收入一般由养老金、传统土地的收入或者子女亲属的接济构成，养老收入的多少和养老金的享有是否影响其在城市还是返乡养老的现实选择？尽管中国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但受当前农民工二代的赡养能力所限，且随着可支付能力的增强，这一群体是否会选择养老院等养老服务？

基于此，本文将重点观察退休农民工这一群体当前的养老模式，即在哪养老和由谁照护的问题，且运用回归分析解释当考虑养老收入这一因素后，传统观念对退休农民工选择何种养老模式的影响是否依然显著。本文力求从养老收入的视角，提出未来完善退休农民工养老模式的政策建议。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文献综述

尽管国外学者对农民工这一中国特有社会现象的研究并不多，但国外有关人口迁

^①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2018年开展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评估》入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计算得到。

移和移民养老的研究 (Leers et al., 2004; Engelhardt et al., 2005; Lacomba & Lagos, 2010) 对本文有所启发。Fontes (2011)、Fontes & Gutter (2006) 通过分析发现移民何时转为当地户籍决定了是否会依赖养老保险。Sevak & Schmidt (2007) 认为移民对社会保险保障功能的预期和依赖性远远低于美国当地的居民。Heim et al. (2012) 同样基于美国的调查发现, 非永久性移民的养老保险参保率要远远低于来自本地的职工。而 Ekberg & Lindh (2016)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 女性移民的养老金待遇比瑞典本国居民高。

除此以外, 国外学者还开展了有关移民养老方式的研究。Edmonds et al. (2005) 发现养老金收入影响了老年人家庭的居住安排决策。Treas & Mazumdar (2002) 的研究表明随子女移民到美国的老年人无法较好地适应当地生活, 其原因在于家庭以外的社交隔绝。De Valk & Schans (2008) 发现移民中的老年人同样希望子女每周能够有更多的探视和照顾。De Jong Gierveld et al. (2015) 指出亲友照护支持和当地融入对缓解移民老年群体的孤独感十分必要。

而国内学者对影响农民工如何养老的因素, 探讨最多的是传统观念和经济因素。一种观点认为, 农民工的传统观念意识难以根除 (李楠, 2010), 文化融合、社会参与、心理融合影响了他们的城市居留意愿 (李树苗等, 2014);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 农民工并非主观不想在城市定居, 而是受经济因素等客观条件所约束 (任远、姚慧, 2007; 杜凤莲, 2014)。

国内学者对养老模式的研究侧重于“在哪养老”、“是否依赖社会保障养老” (沈冰清、郭忠兴, 2018; 邓大松、杨晶, 2019)。不过, 对农民工是否通过养老院等服务来养老的研究十分鲜见。首先, 经济基础决定了农民工于何地养老的意愿, 受知识水平影响的相对低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无法支付城市购房或租房费用 (刘传江、程建林, 2009; 杨菊华, 2018)。农村社保的享有增加了农民工返乡养老的概率, 城市社保的享有增加了农民工留城养老的意愿 (谢娅婷等, 2019)。其次, 农民工的储蓄也决定了其是否选择依靠养老保险获得养老保障, 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文雯, 2015; 夏柱智、贺雪峰, 2017)。不过, 随着中青年农民工的回流, 相较养老保险而言, 农村老年人更有可能依靠子女养老 (李放等, 2019)。

综上所述, 经济保障是国外移民和中国农民工选择如何养老的关键因素, 且中国农民工还受“落叶归根”、“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影响, 不过究竟哪一方的影响更多, 先行文献并没有得出结论, 且大多数研究针对于目前正值壮年的农民工的养老意愿。以往研究中将经济因素拘泥于社会保障, 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决定了其养老模式

的选择，而非来自养老收入的直接影响，且对于传统观念的界定并无量化，因而鲜有实证分析。在养老模式中，也无专门针对农民工养老服务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增加了将传统观念和养老收入进行对比的研究视角，并将两指标分别量化，从收入角度说明如何增进退休农民工的养老福利。第二，区别于先行文献对“意愿”的判断，本文研究对象是已经到达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的养老“现状”，考察的是在自身条件约束下对养老模式的最优选择。第三，增加了退休农民工对养老服务选择的研究视角，更贴近新时代的社会化养老需求。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根据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发现，传统观念、经济因素分别影响了农民工在何地、由谁照护的养老选择。本文首先假设退休农民工的传统观念影响了这一群体当前的养老模式，但考虑养老收入的影响后，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再显著，即到达退休年龄后农民工的养老收入总额和来源影响了其在城市或农村养老，影响了其由家庭或社会照料。

假设 1：退休农民工养老收入的多少对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即养老收入越高的退休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养老；

假设 2：退休农民工的养老金享有对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即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养老；

假设 3：退休农民工养老收入的多少对照护人的选择具有负向影响，即养老收入越高的退休农民工越不会选择家庭支持，而更倾向于购买机构、社区养老服务；

假设 4：退休农民工的养老金享有对照护人的选择具有负向影响，即对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而言，相较于家庭支持，更倾向于购买机构、社区养老服务。

（二）模型分析

被解释变量之一“养老地点”是典型的有序数据，四个选项按照行政单位级别依次升级。参考 Stewart (2005)、林相森和艾春荣 (2008) 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法，本文运用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 (Ordered Probit Model, 简称 OPM)。模型的输入为影响退休农民工养老地点因素构成的向量，即传统观念或养老收入，由 x_{ij} 表示，输出为养老地点的选择 Y_i ，定义一个潜变量 $y' = x_{ij} \beta + \varepsilon$ ， β 代表参数向量， ε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选择规则为：

$$y = \begin{cases} \text{if } y' \leq r_0 \\ \text{if } r_0 < y' \leq r_1 \\ \text{if } r_1 < y' \leq r_2 \\ \text{if } y' \geq r_3 \end{cases} \quad (1)$$

其中, $r_0 < r_1 < r_2 < r_3$ 为区间的分界点, Y_1 的概率分布为:

$$P(Y_1 = 1 | X_{ij}) = \phi(r_0 - x_{ij}\beta) \quad (2)$$

$$P(Y_1 = 2 | X_{ij}) = \phi(r_2 - x_{ij}\beta) - \phi(r_1 - x_{ij}\beta) \quad (3)$$

$$P(Y_1 = 3 | X_{ij}) = \phi(r_3 - x_{ij}\beta) - \phi(r_2 - x_{ij}\beta) \quad (4)$$

$$P(Y_1 = 4 | X_{ij}) = 1 - \phi(r_2 - x_{ij}\beta) \quad (5)$$

最后利用以上概率分布,通过极大似然法,对参数 β 和 ε 进行估计。

被解释变量之二“照护支持”并没有明确的高低次序之分,为无序多分类被解释变量。参考丁友刚和宋献中(2011)、Dash et al.(2016)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法,本文采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简称MNL)。

根据本文假设,对于任意的选择 $j=1, 2, \dots, J$,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ln \left[\frac{P(y=j|x)}{P(y=J|x)} \right] = \alpha_j + \sum_{k=1}^k \beta_{jk} x_k + \varepsilon \quad (6)$$

其中, $P(y=j|x)$ 表示退休农民工对第 j 种照护支持选择的概率, x_k 表示影响退休农民工选择谁来照顾的解释变量,即传统观念或养老收入, β_{jk} 表示这些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向量, ε 是随机误差项。以 J 为参照类型,退休农民工选择其他的照护支持与选择 J 作为照护支持的比值 $\frac{P(y=j|x)}{P(y=J|x)}$ 为事件发生比,即相对于参照组而言,被解释变量发生可能性的倍数,下文用 $\exp(\beta)$ 表示。如果 $\exp(\beta) > 1$,表示正相关,说明事件发生可能性增加;如果 $\exp(\beta) = 1$,说明事件发生可能性无变化;如果 $\exp(\beta) < 1$,表示负相关,说明事件发生可能性减少。本文将运用极大似然法,对MNL模型进行估计。

(三) 变量设置

本文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2018年开展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评估》入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这一调查以问卷形式展开,问卷内容涉及农民工群体的个人基本信息、收入与支出状况、工作经历、健康状况、参保情况等。课题组分别赴河南省洛阳市、商丘市,山东省济宁市、聊城市,四川省成都市、绵阳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马鞍山市等农民工外出大市开展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896份(以家户为单位),涵盖东、中、西部三地区,选取样本的性别分布均匀,具有一定代

表性，结论可信度较强。考虑到部分变量值缺失，最后选取了 10514 个样本（以个人为单位）。

根据《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定义，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研究运用这一定义，同时附加男性到达 60 周岁、女性到达 50 周岁的条件，筛选出“退休农民工”这一研究主体，样本量为 1748 个。

先来看被解释变量。 Y_1 指养老地点，“您现在的居住地”的选项为：非乡镇政府所在村、乡镇政府所在地、县城街道、市区街道，分别赋值 1、2、3、4。 Y_2 指照护支持，“如果需要照护，请问主要由谁来照护？（多选，限选三项）”的选项分别为：子女/媳婿、配偶、父母/岳父母/公婆、孙子女/媳婿、兄弟姐妹、其他亲友、保姆、养老院、社区服务站、目前无人照护、其他。本文根据照护支持来源不同，合并为养老服务、子女等亲属、无人照护三项，并将“养老服务”设为参照组。

再来看解释变量。 X_1 指养老收入金额，选取“您个人 2017 年一年的总收入（元）”的答案，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种地收入等）、财产性收入（每月的房租收入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低保收入等）。为避免异方差影响，对此进行对数化处理。 X_2 指养老收入来源，选取“您不工作后的养老收入来源主要是否为养老金/退休金”的答案，将选项“否”、“是”分别赋值 1、2。 X_3 指家庭规模，参考先行文献发现，家庭规模能够一定程度上代表传统观念（贾俊雪等，2011；谢德金，倪志良，2014），家庭规模越大，代表传统观念越强。因此，选取“您的家庭成员共有多少人”作为传统观念的指标。 X_4 指流动城市数量，根据以往有关乡土情结的研究可得，流动城市数量亦能够指代传统观念（费孝通，1998；刘守英、王一鸽，2018），流动频率越高，传统观念越淡薄。因此，也选取“自工作以来，共在几个城市工作过”的答案指代传统观念。

依据调查问卷设置和先行文献研究惯例，本文选取被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特征、社会信息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前者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健康状况，后者包括户口类型^①、婚姻状况、参保地省份、学历。表 1 报告了以上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统计意义。

① 这里指当前的户口类型，“退休农民工”指有过农民工经历的群体，有可能当前的户口类型已经转为非农业。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养老地点	location	1 = 非乡镇政府所在村(31.22%) 2 = 乡镇政府所在地(24.32%) 3 = 县城街道(15.76%) 4 = 市区街道(28.69%)	1739	2.42	1.20
	照护支持	care	1 = 养老服务(7.58%) 2 = 子女等亲属(84.83%) 3 = 无人照护(7.58%)	211	2.00	0.39
解释变量	养老收入总额	income	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元)	1633	26723.41	29338.40
	养老收入来源	pension	1 = 无养老金(22.50%) 2 = 有养老金(77.50%)	1729	1.23	0.42
	家庭规模	family	家庭成员数量	1724	3.61	1.81
	流动城市数量	migrant	外出打工的城市数量	1718	1.62	1.84
控制变量	年龄	age	年龄(岁)	1748	63.20	8.28
	年龄的平方	age2	年龄的平方	1748	4062.46	1085.10
	性别	gender	1 = 男(36.78%); 2 = 女(63.22%)	1748	1.63	0.48
	健康状况	health	1 = 不好(21.80%) 2 = 一般(30.03%) 3 = 好(48.17%)	1748	2.26	0.79
	户口类型	id	1 = 农业(50.60%) 2 = 非农业(28.11%) 3 = 居民(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21.29%)	1742	1.71	0.80
	婚姻状况	marriage	1 = 有配偶(88.73%) 2 = 无配偶(11.27%)	1722	1.11	0.32
	参保地	area	1 = 安徽(10.58%) 2 = 河南(10.58%) 3 = 山东(39.59%) 4 = 四川(39.24%)	1748	3.08	0.96
	学历	education	1 = 小学及以下(50.40%) 2 = 中学(43.18%) 3 = 大学及以上(6.42%)	1744	1.56	0.6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2018年开展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评估》入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实证分析

（一）传统观念、养老收入对养老地点的影响

运用有序 Probit 回归分别分析了代表传统观念的两变量对退休农民工养老地点的选择，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 1 为解释变量是家庭规模的基准模型，家庭规模的系数为负，并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模型 2、模型 3 在此基础上分步加入个人基本特征、社会信息特征两方面的控制变量，这一系数仍显著为负。这说明家庭规模越小，家庭成员数量越少，即退休农民工的传统观念越弱，养老地点的行政级别越高，换言之，越可能在城市养老。

表 2 传统观念对养老地点的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family	-0.0658 *** (-4.51)	-0.0651 *** (-4.44)	-0.0406 *** (-2.68)			
migrant				0.0445 *** (3.14)	0.0428 *** (3.01)	0.0354 ** (2.43)
ag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nage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gende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health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d			控制			控制
marriage			控制			控制
area			控制			控制
education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15	1715	1667	1712	1712	1665
R ²	0.0044	0.0092	0.0618	0.0022	0.0071	0.0613

注：括号内为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 2018 年开展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评估》入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计算得到。

模型4为解释变量是流动城市数量的基准模型，流动城市数量的系数为正，并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模型5、模型6在此基础上分步加入个人基本特征、社会信息特征两方面的控制变量，这一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流动城市数量越多，即退休农民工的传统观念越弱，更倾向于选择行政级别越高的养老地点，越可能在城市养老。

运用有序Probit回归分别分析了养老收入总额、“是否有养老金”两变量对退休农民工养老地点的选择，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养老收入总额、来源对养老地点的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income	0.3880 *** (13.13)	0.3854 *** (13.02)	0.3830 *** (12.91)			
pension				0.4291 *** (6.32)	0.4363 *** (6.40)	0.4219 *** (6.11)
family		-0.0188 (-1.28)	-0.0125 (-0.80)		0.0208 (1.45)	0.0173 (1.14)
migrant			-0.0234 (-1.41)			0.0292 * (1.89)
ag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nage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gende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health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arriag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rea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ducation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70	1452	1446	1671	1649	1643
R ²	0.1021	0.1038	0.1267	0.0692	0.0709	0.0715

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2018年开展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评估》入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计算得到。

模型1为解释变量是养老收入总额的基准模型，养老收入总额对数值的系数为正，并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模型2、模型3在此基础上分步加入代表传统观念的家庭规模、流动城市数量的控制变量，这一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养老收入总额对退休农民工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正向的影响，即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收入越高，养老地点的行政级别越高，换言之，越可能在城市养老，与本文的假设1相符。且加入养老收入变量后，发现原来显著的传统观念变量不再显著，说明当前是养老收入决定了退休农民工在城市还是农村养老，而非传统观念。

模型4为解释变量是“是否有养老金”的基准模型，“是否有养老金”的系数为正，并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模型5、模型6在此基础上分步加入代表传统观念的家庭规模、流动城市数量的控制变量，这一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是否有养老金对退休农民工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正向的影响，即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行政级别越高的养老地点，换言之，越可能在城市养老，而没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选择回农村养老的可能性更大，与本文的假设2相符。且加入“是否有养老金”变量后，发现原来显著的传统观念变量不再显著或显著性减弱，说明当前是养老金的享有决定了退休农民工在城市还是农村养老，而非传统观念。

（二）传统观念、养老收入对照护支持的影响

首先进行了Hausman-McFadden检验，统计量的P值接近于1，表明未拒绝原假设，因而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分析传统观念、养老收入对退休农民工照护支持选择的影响是有效的。分别在两模型中加入了个人基本特征、社会信息特征两方面的控制变量，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程度与单变量回归中的相同，说明模型是稳健的。受篇幅所限不再罗列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4所示，模型1考察了家庭规模对退休农民工照护支持选择的影响，家庭规模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家庭规模代表的传统观念对子女等亲属或无人照护有正向影响，家庭规模越大，传统观念越强，越可能选择子女等亲属或无人照护；反之则越可能选择养老服务。发生比均大于1，传统观念强的退休农民工选择子女等亲属或无人照护状态分别是传统观念弱的1.71倍、1.64倍。换言之，传统观念越弱的退休农民工越倾向于购买机构和社区的养老服务。

模型2考察了流动城市数量对退休农民工照护主体选择的影响，流动城市数量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流动城市数量代表的传统观念对

表4 传统观念对照护支持的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①养老服务/ ②子女等亲属		①养老服务/ ③无人照护		①养老服务/ ②子女等亲属		①养老服务/ ③无人照护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family		0.1815*** (3.05)	1.7070	0.1938** (2.34)	1.6410				
migrant						-0.4890** (-2.46)	0.6134	-0.8443*** (-3.18)	0.4298
age		控制	1.4416	控制	1.2272	控制	1.4030	控制	1.1368
lnage2		控制	0.0000	控制	0.0000	控制	0.0000	控制	0.0001
gender		控制	0.9294	控制	0.2897	控制	0.9564	控制	0.2880
health (不好)	一般	控制	0.4417	控制	0.3893	控制	0.4726	控制	0.2384
	好		1.3429		3.9613		1.2326		1.5071
id(农业)	非农业	控制	0.8677	控制	0.5575	控制	1.0981	控制	0.6671
	居民	控制	0.5236	控制	2.6576	控制	0.5925	控制	2.7766
marriage		控制	0.3765	控制	6.8454	控制	0.3545	控制	4.4393
area(安徽)	河南	控制	0.1735	控制	0.0770	控制	0.6235	控制	0.1071
	山东		0.1173		0.0227		0.5601		0.0571
	四川		0.3594		0.3573		1.4137		0.5421
education (小学及以下)	中学	控制	1.4688	控制	2.7943	控制	1.4981	控制	2.4638
	大学及以上		1.0867		1.4733		0.8495		3.2418
常数项			72.1113 (1.27)		92.1901 (0.74)		72.6951 (1.27)		72.8233 (0.62)
观测值		206				208			
R ²		0.1590				0.1423			

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2018年开展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评估》入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计算得到。

子女照护有负向影响，流动城市越少，传统观念越强，越可能选择子女等亲属或无人照护；反之则越可能选择养老服务。发生比均小于1，说明与传统观念强相比，传统观念弱的退休农民工选择子女等亲属或无人照护意愿下降。因此，再次证明传统观念越弱的退休农民工越倾向于购买机构和社区的养老服务。

进而运用多分类 Logit 回归模型分别分析了养老收入总额和养老收入来源对退休农民工照护支持的选择，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X 为控制变量，与表 3 中相同。

表 5 养老收入总额、来源对照护支持的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①养老服务/ ②子女等亲属		①养老服务/ ③无人照护		①养老服务/ ②子女等亲属		①养老服务/ ③无人照护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i>lnincome</i>	-0.4991 ** (-2.39)	0.6068	-0.8853 **** (-3.17)	0.4127	-0.4747 ** (-2.30)	0.6221	-0.7944 **** (-2.95)	0.4522
<i>pension</i>								
<i>family</i>					-0.1241 (-0.93)		-0.4687 (-0.72)	
<i>migrant</i>					0.2768 (1.10)		0.2544 (0.82)	
X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7941 (-0.04)		92.2005 (0.78)		87.3412 (1.49)		112.6671 (0.94)	
观测值	167				207			
R ²	0.2130				0.1331			
变量名称	模型 3				模型 4			
	①养老服务/ ②子女等亲属		①养老服务/ ③无人照护		①养老服务/ ②子女等亲属		①养老服务/ ③无人照护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i>lnincome</i>								
<i>pension</i>	-0.8092 ** (-2.41)	0.4454	-0.8517 (-1.38)	0.4267	-0.8541 ** (-2.42)	0.4257	-0.4690 (-0.72)	0.6259

续表

变量名称	模型 3				模型 4			
	①养老服务/ ②子女等亲属		①养老服务/ ③无人照护		①养老服务/ ②子女等亲属		①养老服务/ ③无人照护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i>family</i>					-0.0215 (-0.21)		-1.0160 (-1.19)	
<i>migrant</i>					0.1750 (1.08)		0.1031 (0.43)	
<i>X</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3234 (0.19)		154.0019 (1.20)		103.4127* (1.70)		128.0113 (1.01)	
观测值	166				205			
R ²	0.2645				0.1737			

注：括号内为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 2018 年开展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评估》入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计算得到。

如表 5 所示，模型 1 考察了养老收入总额对退休农民工照护支持选择的影响，养老收入对数值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养老收入越高的退休农民工越倾向于购买机构和社区的养老服务。在模型 2 中加入代表传统观念的两变量，养老收入总额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然而，在养老收入的影响下，传统观念对退休农民工照护支持选择的影响不再显著。发生比分别为 0.6221、0.4522，说明养老收入高的退休农民工选择子女等亲属或无人照护的概率相比养老收入低的退休农民工下降，也就是说，养老收入较高的退休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养老服务。该结论与本文的假设 3 相同。

模型 3 考察了养老收入来源对退休农民工照护主体选择的影响，是否有养老金的回归系数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越倾向于购买机构和社区的养老服务，但是否有养老金对养老服务和无人照护状态之间的选择无显著影响。在模型 4 中加入代表传统观念的两变量，是否有养老金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然而，在享有养老金的影响下，传统观念对退休农民工照护支持选择的影响不再显著。

发生比为 0.4257，说明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选择子女等亲属的概率相比无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下降，也就是说，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养老服务。该结论与本文的假设 4 相同。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是其他表征方法的检验。运用“养老收入水平”这一指标替换“养老收入总额”，作为衡量退休农民工养老收入的指标，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这里的养老收入水平为退休农民工的年养老收入与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运用加权后的“养老金收入”重新计算“养老收入总额”。在调查中发现 77.5% 的退休农民工由养老金提供经济保障，以下两个原因导致养老金享有的比例偏高：在调研地四川，由于征地而将农村居民加入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体系；在河南，因课题组安排，调研地点仅定为城市。因此通过加权的计算方法，能够降低这一比例偏高带来的回归结果偏差。

然后是加入遗漏变量的检验。在以退休农民工养老地点选择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考虑可能存在由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被调查对象中仍有 1052 位退休农民工还在工作，当前的工作状况也会影响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模式选择，也就是说，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会影响退休农民工对当前居住地的选择。因此，继续加入工作单位类型（个体 = 1，合资、国有、集体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 2，私营 = 3，土地承包 = 4，其他 = 5）、工作行业类型（农林牧渔 = 1，制造业 = 2，建筑业 = 3，其他 = 4）、工作职业类型（务农 = 1，非技术工种 = 2，私营业主 = 3，其他 = 4）作为控制变量，以解决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以上两种方式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均显示解释变量，即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收入总额（水平）对数值、是否有养老金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保持一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反映了各变量之间较强的独立性，模型对不同变量以及不同样本来说是稳健的。因此，前文所得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较好。限于篇幅，不再罗列数据处理结果。

最后是加入工具变量的检验。尽管前文运用较为科学的计量模型估计了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收入对养老地点选择的影响，但这一结果并不能严谨地判断是养老收入总额影响了养老地点，还是养老地点的选择影响了养老收入，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

根据工具变量的定义特征，本文选择“养老收入中是否有来自子女亲属的接济”这一指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如果有来自子女亲人的赡养费用，那么能

够大大提高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收入水平，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条件。然而，子女亲属是否赡养老人，并不直接影响退休农民工在城市还是农村养老的选择。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无论退休农民工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均有子女赡养或者不赡养的案例发生。而且，子女是否赡养取决于子女的经济能力和是否具有孝心等社会道德层面问题，当前退休农民工在哪养老也不再反作用于子女的赡养意愿和行为。因此，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条件。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2SLS）回归的方法，解决本文研究假设互为因果的问题。如果养老收入中有来自子女亲属的接济，则取工具变量 *children* 为 1，反之则取 *children* 为 0。*X* 为控制变量，与表 3 中相同。

表 6 报告了退休农民工养老收入总额的 2SLS 回归结果。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 *children* 与内生变量 *lnincome* 显著相关。在 2SLS 回归中还考察了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F 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10，说明工具变量的设定是有效的。在第二阶段的回归中，*lnincome* 的回归系数与表 3 中基准回归结果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一致。因此，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的条件下，前文的实证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表 6 以子女亲属是否赡养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第一阶段 <i>lnincome</i>	第二阶段 <i>location</i>
<i>children</i>	0.5426 *** (9.45)	
<i>lnincome</i>		1.1290 *** (8.58)
<i>X</i>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86	1486
R ²	0.0577	0.0571
F	89.2703	

注：括号内为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 2018 年开展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评估》入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对当前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收入和养老模式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和多分类 Logit 回归模型,考察了退休农民工的传统观念、养老收入总额及其来源对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在退休农民工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中加入养老收入后,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再显著,退休农民工选择在城市或农村养老、由谁照护主要受现实的经济条件约束,而“落叶归根”、“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已经不再对退休农民工选择如何养老产生影响。

其次,退休农民工养老收入的多少对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即养老收入较高的退休农民工倾向于在城市养老;退休农民工的养老金享有对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即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养老。

最后,退休农民工养老收入的多少对照护人的选择具有负向影响,即养老收入越高的退休农民工越不会选择家庭支持,而更倾向于购买机构和社区的养老服务;同时,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购买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更大。

本文还存在一些研究不足。首先,由于截面数据的特点,无法引入时间固定效应的分析及对长期趋势的预测;其次,以照护主体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的样本数量较少,存在影响回归结果的可能,不过从整体来看并不影响最终结论。未来将从横、纵两个方向完善这一调查数据库,进一步充实该领域的经验研究。本文具有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第一,保障农民工的养老金权益进而保证退休后养老模式选择的权利。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解决将近 30% 的退休农民工无养老金的问题;二是提升退休农民工的养老金待遇,保障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享有资格和转移接续。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即便部分有养老金的退休农民工也仅是在农村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直接导致农民工养老收入水平较低,尽管有养老服务的需求但却无力支付。

第二,重视退休农民工再就业进而增加养老收入。为保证退休农民工对养老模式的多样化选择,享有在曾经奉献劳动的城市养老的权利,提高养老收入是关键。该数据库同时显示,60% 的农民工达到退休年龄后仍在工作以增加收入。当前传统的土地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且农民工二代的经济赡养能力较弱,因此社会各界应积极创造相

关就业岗位并健全法律保障,以支持退休农民工再就业。

第三,降低进入门槛以保障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服务供给。尽管养老收入不高,但由于老龄化及空巢化的不断加深,退休农民工对养老服务亦有需求,未来应鼓励在农村开展互助幸福院,接纳返乡农民工。对于选择在城市养老的农民工,根据个人收入设置不同层级的养老服务补贴,最大限度地已将已退休的农民工群体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中,不断促进退休农民工的养老服务可及性。

参考文献:

- 邓大松、杨晶(2019),《养老保险、消费差异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43-55页。
- 丁友刚、宋献中(2011),《基于多元logit模型的国有企业高管更换决策机理研究》,《统计研究》第6期,第35-40页。
- 杜凤莲(2014),《苹果为什么落不远?农民工经济融合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劳动经济研究》第5期,第148-160页。
-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郭秋菊、靳小怡(2016),《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压力应对理论的分析》,《人口学刊》第2期,第29-39页。
- 贾俊雪、郭庆旺、宁静(2011),《传统文化信念、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8期,第3-18页。
- 李放、张瑞霞、沈苏燕(2019),《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影响》,《江汉学术》第4期,第17-26页。
- 李楠(2010),《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与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第102-108页。
- 李树苗、王维博、悦中山(2014),《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研究》,《人口与经济》第2期,第12-21页。
- 林相森、艾春荣(2008),《我国居民医疗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有序probit模型的半参数估计》,《统计研究》第11期,第40-45页。
- 刘传江、程建林(2009),《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济学家》第10期,第66-72页。

- 刘守英、王一鸽 (2018),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管理世界》第 10 期, 第 128 - 146 页。
- 秦雪征、周建波、辛奕、庄晨 (2014), 《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以北京市农民工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第 2 期, 第 56 - 68 页。
- 任远、姚慧 (2007), 《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变化和城市管理——基于对上海的研究》, 《人口研究》第 3 期, 第 71 - 78 页。
- 沈冰清、郭忠兴 (2018), 《新农保改善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吗? ——基于分阶段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 1 期, 第 90 - 107 页。
- 孙婧芳 (2018), 《农民工离市民化有多远? 基于 Sen 的行为能力理论》, 《劳动经济研究》第 5 期, 第 99 - 120 页。
- 文雯 (2015),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状态与相关检验》, 《改革》第 8 期, 第 135 - 148 页。
- 夏柱智、贺雪峰 (2017),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第 12 期, 第 117 - 137 页。
- 谢德金、倪志良 (2014), 《中国传统观念与空间效应对我国房价增长的影响——基于 1998 - 2011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投资研究》第 10 期, 第 70 - 86 页。
- 谢娅婷、郭秋菊、李树茁 (2019), 《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养老地选择的影响》, 《江汉学术》第 4 期, 第 27 - 36 页。
- 杨菊华 (2018), 《制度要素与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 《人口研究》第 1 期, 第 60 - 75 页。
- 于长永 (2012), 《农民“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及转变趋向》, 《人口学刊》第 6 期, 第 40 - 50 页。
- 朱玲 (2014), 《转向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保体系》, 《劳动经济研究》第 4 期, 第 3 - 20 页。
- Dash, Sarojeet, Vinod Vasudevan & Sanjay Kumar Singh (2016). A Piecewise Linear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of Private Vehicle Ownership Behaviour of Indian Households. <https://dx.doi.org/10.1007/s40890-016-0022-9>.
- De Jong Gierveld, Jenny, Suzan Van der Pas & Norah Keating (2015). Loneliness of Older Immigrant Groups in Canada: Effects of Ethnic-Cultural Background.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30 (3), 251 - 268.
- De Valk, Helga & Djamila Schans (2008). ‘They Ought to Do This for Their Parents’:

- Perceptions of Filial Obligations Among Immigrant and Dutch Older People. *Ageing & Society*, 28 (1), 49 – 66.
- Edmonds, Eric, Kristin Mammen & Douglas Miller (2005). Rearranging the Family? Income Support and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in a Low-Income Country.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0 (1), 186 – 207.
- Ekberg, Jan & Thomas Lindh (2016). Immigrants in the Old-Age Pension System: The Case of Swed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4 (5), 5 – 14.
- Engelhardt, Gary, Jonathan Gruber & Cynthia Perry (2005). Social Security and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Evidence from the Social Security Notch.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0 (2), 354 – 372.
- Fontes, Angela (2011). Differences in the Likelihood of Ownership of Retirement Saving Assets by the Foreign and Native-Born.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2 (4), 612 – 624.
- Fontes, Angela & Michael Gutter (2006). Differences in the Onset of Formal Retirement Savings Between Native and Foreign Born Individual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Consumer Interests Annual*, 52, 271 – 280.
- Heim, Bradley, Ithai Lurie & Shanthi Ramnath (2012). Immigrant-Native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Based Retirement Pla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 11 (3), 365 – 388.
- Lacomba, Juan & Francisco Lagos (2010). Immigration and Pension Benefits in the Host Country. *Economica*, 77 (306), 283 – 295.
- Leers, Theo, Lex Meijdam & Harrie Verbon (2004). Ageing, Migration and Endogenous Public Pens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1 – 2), 131 – 159.
- Sevak, Purvi & Lucie Schmidt (2007). How Do Immigrants Fare in Retirement? *Michigan Retirement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 No. 169.
- Stewart, Mark (2005). A Comparison of Semiparametric Estimators for the Ordered Response Model.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 Data Analysis*, 49 (2), 555 – 573.
- Treas, Judith & Shampa Mazumdar (2002). Older People in America's Immigrant Families: Dilemmas of Dependence, Integration, and Isolation.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6 (3), 243 – 258.

Returning or Staying: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ing Arrangement after Retirement for Migrant Workers

Kang Rui¹, Wang Zhen¹ & Pan Jianping²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¹;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²)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what affects the decision-making of living arrangement for retired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places as ‘falling leaves’ or staying where they are by their economic mea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f we control the variable of retired income, the effect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falling leaves’ found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becomes no longer significant. Clearly, retired income to a large extent determines the living arrangement of retired migrant workers. Firstly, retired migrant workers with higher retired income and better access to pension are more likely to stay in the cities, while those less privileged are more likely to return to rural homes. Secondly, retirees with higher income and pension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such as nursing homes, and those with lower income might have to survive themselves or by relatives. Therefore, policy-making needs to address the old-age security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even reemployment for them in order to meet their needs of elderly ca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etired migrant workers, retired income, urban or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for the aged

JEL Classification: J15, J26, H55

(责任编辑: 封永刚)